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脱贫信心 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包智明 焦开山

为了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少数民族群体的脱贫攻坚,在破解结构性约束因素的同时,也需要激发个体和家庭的内在发展动力。反贫困的政策或项目需要给贫困者带去脱贫的希望和信心。国内学术界虽然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仍然处于理论层面的讨论,而较少对其背后各因素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基于民族地区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从多个视角分析与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脱贫信心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少、未婚、受教育水平较低、健康状况较差、自我效能感较低,以及感知的社会支持较少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在未来脱贫信心上显著不足。2020年要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需要针对脱贫信心不足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体,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做到“精准扶志”。

关键词:少数民族 脱贫信心 内生动力 扶志

作者包智明,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504。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规模逐年大幅度减少,平均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1000万人。2020年全国只剩余551万贫困人口和52个贫困县。^①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提出:“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②当前,剩余贫困人口主要分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840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冷仪同学为本研究所做的工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的修改完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参见《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现有贫困人口551万人,贫困县52个》,经济网,2020年3月12日。

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9年12月31日。

布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全国 11 个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大都在西部的民族地区,其贫困人口大都是少数民族群体。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是 2020 年脱贫攻坚的重点对象。

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体脱贫而言,在破解外在的结构性约束因素的同时,也需要激发个体和家庭的内在发展动力。^①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物质上的贫困会带来认知和行为上的一系列后果,^②而认知和行为问题又往往导致物质贫困长期化。以往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和反贫困研究的一个不足就是忽略了个人内部制约因素在使贫困长期化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举措就是提升贫困群体的脱贫志向和脱贫信心。

在政府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和重要会议上,就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问题反复强调“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扶贫要同扶志结合起来”,注重激发贫困群众立足自身实现脱贫的信心决心,^③“扶贫先要扶志”,“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④“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⑤等重要观点,为精神层面的“精准”扶贫指明了方向。

在学术界,有研究表明,即使在不增加外部机会或者放松外部发展障碍的条件下,仅靠改变贫困人员的内部约束或者脱贫志向也可以减少贫困的持久性。^⑥正如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杜芙若(E. Duflo)所言:希望和信心是一种能力,反贫困政策或者项目需要给贫困者带去并且使贫困者意识到希望和信心。^⑦

国内一些研究把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不足归结为精神贫困,并提出了“精神扶贫”的概念,但这些研究大都从强调精神扶贫的重要性出发,提出精神扶贫的途径和策略,^⑧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不同贫困群体在脱贫动力和信心程度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不应该笼统地说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都是落后的和缺乏脱贫的内在动力。实际上,贫困群体也是一个异质性较强的群体。由于不同贫困群体在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内在心理特征上存在差异,导致不同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程度上存在差异性,有些人的信心相对较高,而有些人的信心相对较低。因此,精准扶贫不仅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精准”,还应该包括精神层面上的“精准”。

① 参见邢成举、李小云、张世勇:《转型贫困视角下的深度贫困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为例》,《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② 参见 P. S. Dalton, S. Ghosal, A. Mani, “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6, No. 590, 2015; J. Haushofer and E. Fehr,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Vol. 344, No. 6186, 2014; A. Mani, S. Mullainathan, E. Shafir, J. Zhao,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Vol. 341, No. 6149, 2013; K. D. Vohs, “The Poor’s Poor Mental Power,” *Science*, Vol. 341, No. 6149, 2013。

③ 参见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建》2017 年第 9 期;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 年第 16 期。

④ 《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看望困难群众回访》,新华网,2012 年 12 月 31 日。

⑤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新驱动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华网,2013 年 11 月 5 日。

⑥ 参见 P. S. Dalton, S. Ghosal, A. Mani, “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6, No. 590, 2015。

⑦ 参见 E. Duflo, *Human Values and the Design of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Tanner Lectures, 2012。

⑧ 参见余德华:《论精神贫困》,《哲学研究》2002 年第 12 期;李沿颖:《边疆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群体精神扶贫问题研究》,《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0 年第 1 期;黄婷:《农村精神扶贫困境及对策探析》,《经济研究导刊》2020 年第 4 期;张战胜:《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

脱贫信心是在经验层面上反映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上的不同特征,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做到“精准扶贫”。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与贫困群体脱贫信心有关的因素,精准识别那些脱贫信心严重不足的人员,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策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课题组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从多个方面考察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脱贫信心以及与之有关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少数民族群体历来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①为此,以往研究一方面侧重于从外在的结构因素、制度因素和空间因素分析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发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扶贫的对策和建议;^②另一方面侧重于从文化视角或者民族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群体的贫困和扶贫问题。^③不过,近年来关于贫困和脱贫的研究正逐渐从外在的物质约束条件转向内在的精神约束条件,越来越重视贫困群体的认知和行为问题,即行为贫困或者精神贫困问题。^④虽然贫困群体的认知和行为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核心问题却是“志向失灵”(aspiration failure)。^⑤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 Appadurai)将志向看作是一种文化能力,^⑥志向失灵指的是缺乏一种改变自身状况志向的能力。相比较于富人,穷人更有可能发生志向失灵,即俗语所说的“人穷志短”。

志向是一种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影响着人们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当遇到困难时,志向缺失的人会松懈努力或完全放弃,而那些有较高志向的人会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应对挑战。由于在志向上的缺失,一些贫困人员对脱贫没有信心,安于现状,不愿脱贫或者不想脱贫,对政府实施的扶贫项目不积极不主动,严重依赖于外在的物质救济,^⑦这也严重折损了精准扶贫的效果。^⑧由此可见,在大量扶贫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之下,贫困群体的基本物质生活虽然得到了保障,但是其内生发展能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存在较高的返贫可能性。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② 参见刘小珉:《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反贫困效应研究》,《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邢成举、李小云、张世勇:《转型贫困视角下的深度贫困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为例》,《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张丽君、董益铭、韩石:《西部民族地区空间贫困陷阱分析》,《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③ 参见李俊杰、耿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刘华军:《文化转型与少数民族脱贫——以贵州少数民族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刘小珉:《民族视角下的农村居民贫困问题比较研究——以广西、贵州、湖南为例》,《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参见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余德华:《论精神贫困》,《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⑤ 参见 P. S. Dalton, S. Ghosal, A. Mani, “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6, No. 590, 2015.

⑥ 参见 A. Appadurai, *The Capacity to Aspire: 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4.

⑦ 参见赵宇:《让精神扶贫为脱贫攻坚固本培元——关于河北省在精准扶贫中全面实施精神扶贫的调查及建议》,《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

⑧ 参见张志胜:《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关于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原因,一些研究从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进行了探究。与以往区域性扶贫模式相比,当前的精准扶贫在“真脱贫”和“脱真贫”上有显著改进,但是这种扶贫模式仍旧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对扶贫对象实施了“包保管”式的服务,将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救济”,^①这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形成或者强化了贫困人员对外在援助项目“等靠要”的依赖心理,^②限制了他们自身的主动性和对生活的责任感。^③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过度的物质帮扶会对贫困人员造成负向激励,使得他们只顾及“不劳而获”的眼前利益而抑制了自身主动脱贫的动力。^④

此外,也有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贫困群体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及价值体系,其主要表现就是感到自卑、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等,这就是所谓的贫困文化。^⑤处于贫困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和群体,较少以外在群体为参照来观察自己的问题,也意识不到自己与外面世界的其他人之间的异同之处。通过代际传递,贫困文化处于一种长期的自我维持中。消除物质贫困本身还不足以消除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人们可以轻松地说出消除贫困的方法,但是改变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贫困群体都生活在贫困文化中,而是处于一种文化的贫困中,^⑥也就是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贫困地区教育相对落后,致使贫困群众所受教育不足,文化水平较低,这导致接受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比较差,从而导致脱贫信心和志气的缺乏。^⑦

另外,也有研究认为贫困群体脱贫动力不足与其较低自我效能感有关。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完成某些具体任务所具有能力的综合评价。自我效能感的判断决定了人们将花费多少精力,以及面对障碍或厌恶经历时他们会坚持多长时间。^⑧长期贫困带来的社会排斥、刻板印象威胁、自我污名、耻辱感和不被尊重感会降低穷人的自我效能感。^⑨面对困境,一些贫困群体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当前的环境,缺少改变现状的信心和勇气,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上,而是放在对失败和不幸的担忧上。^⑩比如,国内一些调查就发现,贫困人员往往担心以自己现有的文化知识和能力学不会新知识和新技术,进而不愿意参与新项目,担忧“异地搬迁”之后难以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等。^⑪

① 参见张琦、刘欣:《加强“精神扶贫”助推脱贫攻坚质量提升》,《国家治理》2018年第2期。

② 参见侯志茹、郭玉鑫、吴本健:《行为经济学视角下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内在逻辑》,《东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3期。

③ 参见 A. V. Banerjee and E. Duflo, “Mandated Empowerment: Handing Antipoverty Policy back to the Poor?”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36, No. 1, 2008。

④ 参见赵书栋、李炳全:《精神扶贫:精准扶贫的内生性动力》,《延安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⑤ 参见 O.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ociety*, Vol. 1, No. 1, 1963。

⑥ 参见 G. Ladson-Billings, “It’s not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t’s the Poverty of Culture: The Problem with Teacher Educat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37, No. 2, 2006。

⑦ 参见曹艳春、侯万锋:《新时代精神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⑧ 参见 A. Bandur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84, No. 2, 1977。

⑨ 参见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⑩ 参见 A. Bandura,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37, No. 2, 1982; M. E. Gist and T. R. Mitchell, “Self-efficac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ts Determinants and Mallea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7, No. 2, 1992。

⑪ 参见莫光辉、张菁:《基于“人本主义”视角的贫困人口扶志扶智路径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

国外已有研究表明,贫困会给人们带来相当大的生活压力,^①而社会,支持在缓解生活压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社会支持能让人们感觉到被关爱、被尊重,也让人觉得自己是互惠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人们之间的这种支持性互动关系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生活困境或者生活压力所带来的心理后果。^③ 国内已有研究也注意到了社会支持对于脱贫的影响,认为社会支持不仅缓解经济贫困和健康贫困,而且还能缓解精神贫困,强调发挥社会支持对于提升贫困群体的主动脱贫意识、激发其自身发展潜能和动力的重要作用。^④

近年来,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有关贫困与认知功能关系的文章,从科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贫困群体内生动力问题的新视角。沙阿(A. K. Shah)等的文章认为,资源的稀缺性会产生相应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看待问题和做出决策的方式。对于穷人而言,在物质资源上的稀缺性会带来日常生活支出上的窘迫性。这会导致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日常杂货的支出上,而对其他问题较少注意,尤其是对未来的生活更少注意。^⑤ 马尼(A. Mani)等的文章也认为贫困阻碍了人们的认知功能,^⑥与贫困相关的担忧会消耗智力资源,而用于其他任务的智力资源相对较少。贫困意味着不仅要应对资金短缺,而且还要应对认知资源短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贫困人员的能力较弱不是因为固有的特征,而是因为贫困的背景会加重负担并阻碍认知能力,使其不得不减少对未来生活的规划。豪斯霍弗(J. Haushofer)和费尔(E. Fehr)的文章认为,贫困会导致压力和负面的情绪状态,进而可能导致目光短浅和规避风险的决策。^⑦

综上所述,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学术界,都普遍认识到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如期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精神支撑,也是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保障。国内学术界虽然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问题或者精神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仍然处于理论层面的讨论,而较少对其背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此外,以往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忽略了贫困群体的异质性问题。即使贫困群体在物质生活状态上都处于匮乏状态,但致贫的原因也可能是多样的,由此带来的脱贫难度和信心度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贫困群体都是思想观念落后的和文化水平低的,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贫困群体是“愚昧”或者“懒惰”的。贫困群体脱贫信心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是贫困导致的认知后果和行为后果,而且这些后果在贫困群体中的分布同样存在异质性。虽然我们会看到一些贫困人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但也能看到有些贫困人员积极进取、主动脱贫。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中看到的“人穷志不穷”和“人穷志短”的两种矛盾现象,恰恰说明了客观的贫穷状态对贫困人群主观志气的影响并

① 参见 D. Belle, "Poverty and Women's Mental Heal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45, No. 3, 1990.

② 参见 N. Lin, W. M. Ensel, R. S. Simeone, W. Kuo, "Social Support,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Illness: A Model and An Empirical Tes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20, No. 2, 1979; B. L. Wilcox, "Social Support, Life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Test of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9, No. 4, 1981.

③ 参见 S. Cobb,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Vol. 38, No. 5, 1976.

④ 参见侯斌:《精准扶贫背景下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对城乡贫困老年人口脱贫的影响》,《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汤欣:《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户社会支持情况的分析》,《社会福利》2020年第2期。

⑤ 参见 A. K. Shah, S. Mullainathan, E. Shafir, "Som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too Little," *Science*, Vol. 338, No. 6107, 2012.

⑥ 参见 A. Mani, S. Mullainathan, E. Shafir, J. Zhao,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Vol. 341, No. 6149, 2013.

⑦ 参见 J. Haushofer and E. Fehr,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Vol. 344, No. 6186, 2014.

不一致。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程度上并不都是低下的。贫困群体的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居住环境以及外部结构性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其脱贫信心。为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从地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家庭劳动力状况、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分析和讨论影响少数民族贫困群体脱贫信心的各种因素,为在扶贫工作中识别出脱贫信心严重不足人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8年和2019年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综合性社会调查。^①为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在抽样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每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城乡分布状况,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最终,本调查数据涵盖了云南省13个市(州)的36个县(区、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5个地级市的22个县(区、市)。本调查的总样本规模为6542人,其中少数民族样本4065人,覆盖了16个主要少数民族。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少数民族群体中被政府认定为贫困户和自我评价为贫困的样本,样本总规模为1411人。我们之所以把没有被政府认定为贫困户但是自我评价为贫困的样本也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政府在认定贫困户时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而漏评了一些实际贫困的家庭。此外,通过主观定义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把相对贫困的含义也包括进来,以便更能真实地测量人们实际的生活状态。

(二)变量及其测量

在我们的调查中,用如下问题测量了受访者脱贫的信心程度:“您认为在未来的一两年内自己家庭能否摆脱贫困。”这个问题的选项共有三个:不可能(编码为1)、有一些困难(编码为2)和完全有可能(编码为3)。本研究把此变量看作是一个定序变量(ordinal variable)。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了地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情况、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健康状况、自我效能感以及社会支持状况等变量。性别变量取值有两个:男性(编码为0)和女性(编码为1)。年龄取值范围在18岁至88岁之间。婚姻状况变量共有三个取值:未婚(编码为1),已婚(编码为2),离婚或丧偶(编码为3)。本研究根据“您家共有几口人”以及“家人的年龄分别是多少岁”两个问题统计家庭中18岁至59岁的劳动力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取值范围在0到7之间。受教育程度变量共四个取值:文盲(编码为1),小学(编码为2),

^① 本课题组已完成的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只有这两个地区、两个年份的调查。本研究把两个地区、两个邻近年份的调查数据合并为一个数据集进行分析,是定量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即所谓的pooled data analysis。比如,国内的很多研究把CGSS多个调查年份的数据汇总在一起进行分析。在对这样的汇总数据进行分析时,只要在模型中加入表示数据年份的变量就可以控制所谓的“偏误”问题。在本研究中,不同年份数据表现为不同地区数据,故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表示地区的变量,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年份(地区)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偏误问题。此外,本研究的两个地区数据间隔只差1年,在这1年期间中国的脱贫攻坚政策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动。另外,中国的脱贫攻坚政策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有所差异,但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实施方式上,在本质上并无显著差异。基于此,不同地区的政策背景差异并不会显著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和结论。为验证地区变量的交互作用,我们在模型中尝试加入了重要自变量与地区变量的交互项,结果发现交互项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也就是说,本研究中的重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在云南地区和宁夏地区并无显著差异。

初中(编码为3),高中及以上(编码为4)。根据样本的四分位数,把家庭人均年收入总共划分为四个等级:等级1(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样本的25%分位数,编码为1),等级2(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样本25%分位数到50%分位数之间,编码为2),等级3(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分位数到75%分位数之间,编码为3)和等级4(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样本75%分位数,编码为4)。

在健康状况方面,本研究选取自评健康状况,过去两周是否有不适感,过去一个月是否门诊就医,过去一年是否住院四项指标。自评健康状况是一个定序变量,共有五个取值:非常好(编码为1),好(编码为2),一般(编码为3),差(编码为4),非常差(编码为5)。过去两周是否有不适感分为两种情况:过去两周没有不适感(编码为0),过去两周有不适感(编码为1)。过去一个月是否门诊就医包括两种情况:过去一个月没有看过医生(编码为0),过去一个月去看过医生(编码为1)。过去一年是否住院包括两种情况:过去一年没有住院(编码为0),过去一年有住院(编码为1)。为了获得一个对健康的整体测量,本研究首先用这四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项目反映模型(Item Response Model),然后,根据此模型计算了一个整体健康指数变量。这个变量值越高,说明整体健康状况越差。

在自我效能感方面,本研究选取生活的可控性指标测量自我效能感高低。生活的可控性是根据受访者对“您觉得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当前的生活”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测量。本变量的取值共有三个:生活很难控制(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和生活可以控制(编码为3)三类。

在社会支持方面,本研究根据“假如您遇到经济困难或生活中的其他问题时,您觉得会得到较多的帮助吗”问题的回答测量受访者预期的社会支持。这个问题的选项共有五个: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非常少。本研究把问题回答中“非常少”和“比较少”合并为一类,称为“较少”,将回答“非常多”与“比较多”合并为一类,称为“较多”。因此,预期社会支持这一变量共有三个取值:较少(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和较多(编码为3)。关于变量的测量及其描述统计详见表1。

表1 变量的测量及其分布情况

变量及其测量		家庭短时期内能脱贫吗						总计	
		不可能		有些困难		完全可能			
地区	云南	228	26.03	536	61.19	112	12.79	876	100
	宁夏	127	23.74	350	65.42	58	10.84	535	100
性别	男	214	24.40	550	62.71	113	12.88	877	100
	女	141	26.40	336	62.92	57	10.67	534	100
年龄组	18—39岁	101	20.16	328	65.47	72	14.37	501	100
	40—49岁	94	23.68	255	64.23	48	12.09	397	100
	50—59岁	73	24.83	188	63.95	33	11.22	294	100
	60岁以上	87	39.73	115	52.51	17	7.76	219	100
婚姻状况	未婚	40	21.16	125	66.14	24	12.70	189	100
	已婚	276	24.82	700	62.95	136	12.23	1112	100
	离婚或丧偶	39	35.45	61	55.45	10	9.09	110	100

变量及其测量		家庭短时期内能脱贫吗						总计	
		不可能		有些困难		完全可能			
家庭劳动力数量	0个	36	48.65	34	45.95	4	5.41	74	100
	1个	47	36.43	69	53.49	13	10.08	129	100
	2个	110	23.97	297	64.71	52	11.33	459	100
	3个	89	23.80	245	65.51	40	10.70	374	100
	4个及以上	73	19.47	241	64.27	61	16.27	375	100
教育程度	文盲	120	29.93	244	60.85	37	9.23	401	100
	小学	145	27.41	326	61.63	58	10.96	529	100
	初中	70	21.02	214	64.26	49	14.71	333	100
	高中及以上	20	13.51	102	68.92	26	17.57	148	100
家庭收入水平	等级1	218	31.10	425	60.63	58	8.27	701	100
	等级2	82	21.19	257	66.41	48	12.40	387	100
	等级3	42	19.63	134	62.62	38	17.76	214	100
	等级4	13	11.93	70	64.22	26	23.85	109	100
自评健康状况	非常好	31	17.03	118	64.84	33	18.13	182	100
	好	115	19.26	398	66.67	84	14.07	597	100
	一般	87	26.20	209	62.95	36	10.84	332	100
	差	104	40.00	140	53.85	16	6.15	260	100
	非常差	18	45.00	21	52.50	1	2.50	40	100
是否不适	否	199	20.88	629	66.00	125	13.12	953	100
	是	156	34.06	257	56.11	45	9.83	458	100
是否门诊	否	248	22.52	716	65.03	137	12.44	1101	100
	是	107	34.52	170	54.84	33	10.65	310	100
是否住院	否	274	23.66	749	64.68	135	11.66	1158	100
	是	81	32.02	137	54.15	35	13.83	253	100
可控制性	难控制	152	38.19	214	53.77	32	8.04	398	100
	一般	120	22.06	372	68.38	52	9.56	544	100
	可以控制	83	17.70	300	63.97	86	18.34	469	100
社会支持	较少	89	43.84	102	50.25	12	5.91	203	100
	一般	149	24.59	391	64.52	66	10.89	606	100
	较多	117	19.44	393	65.28	92	15.28	602	100

(三)分析方法

由于本数据是一个多层次的数据结构(县级单位包含了个体单位,比如多个个体属于同一个县),而且因变量是一个定序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了两层次混合效应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Two-level mixed-effects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与传统模型相比,多层模型考虑

到了在同一层级内的单位要比不同层级内的单位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比如来自同样一个县的个体在脱贫信心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把个体观察值之间的依赖性考虑了进来,也使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具有统计上的有效性。通过使用多层次信息,能够提高标准误和显著性检验的准确性(传统的统计检验的标准误太小,从而可能获得了一个“虚假的”统计显著结果)。^①此外,与传统模型相比,混合效应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既包括了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也包括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如下所示:

$$P(y_{ij} > k | X_{ij}, \kappa, \mu_{oj}) = H(X_{ij}\beta + \mu_{oj} - \kappa_k)$$

其中 y_{ij} 为因变量,这里表示脱贫信心; j 表示层二单位,即县级单位; i 表示层一单位,即受访者。 k 为因变量的某一类别; X_{ij} 是协变量矩阵,即所谓的自变量; κ 表示截距的切点(cutpoints,也可以成为门槛值);^② μ_{oj} 为县级单位效应,又被称为随机效应,表示的是县级单位层面上未观测到的因素对因变量截距的影响,所以本模型也可以称之为随机截距模型,一般假定它服从期望值为0的多元正态分布,在模型估计时,主要输出它的方差。 β 被称为固定效应,对应着传统模型中纳入进模型中的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P(y_{ij} > k | X_{ij}, \kappa, \mu_j)$ 表示因变量取值大于第 k 个类别的概率。 $H(\cdot)$ 是 logistic 累积分布函数, κ_k 表示与因变量某个类别 k 对应的切点值。因为我们的因变量有三个取值,所以有两个切点值。 κ_1 表示与第1个类别对应的切点值, κ_2 表示与第2个类别对应的切点值。

在拟合模型时,我们首先拟合一个只包含地区、性别和年龄等变量的模型,即模型1。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相关变量,分别构建相关模型,总共有7个模型。由于所有模型都是嵌套模型,通过对两个模型进行似然比率检验和比较模型拟合度指标,可以确定相对较优的模型并进而确定相关变量对因变量是否有显著性的影响。我们使用 STATA 软件的 `melogit` 命令对所有的模型进行估计。

四、研究结果

表2给出了混合效应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我们纳入了地区、性别、年龄等变量。根据模型1,年龄变量对脱贫信心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脱贫信心越不足。年龄每增加一岁,脱贫信心大约会下降2.0%。不同性别的群体在脱贫信心上没有显著差异。此外,模型1也显示宁夏地区和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在脱贫信心上无显著差异。与模型1相比,在模型2中我们纳入了婚姻和家庭方面的两个变量。通过对模型2和模型1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15.32;自由度=3;P=0.002)和比较两个模型的AIC数值,模型2显著优于模型1。这说明婚姻状况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至少有一个变量对脱贫信心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与未婚群体相比,已婚、离婚或者丧偶群体认为自己家庭近期内脱贫的可能性更高,

^① 参见 Joop J. Hox, *Multilevel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Academic, 2010。

^② 上述模型也可以用潜变量的方法进行理解。假如我们有一个潜变量 y_{ij}^* ,它是一个连续型变量,即所谓的定距变量。然后我们假设有一组未知的切点值(或者成为门槛值): $\kappa_1 < \kappa_2 \dots < \kappa_{k-1}$ 。如果 $y_{ij}^* \leq \kappa_1$,则我们观察到的定序变量值为1;如果 $\kappa_1 < y_{ij}^* \leq \kappa_2$,则我们观察到的定序变量值为2;如果 $\kappa_2 < y_{ij}^* \leq \kappa_3$,则我们观察到的定序变量值为3,以此类推。关于定序因变量模型的相关介绍,参见[美]丹尼尔·A. 鲍威斯(Daniel A. Powers)、谢宇著,任强等译:《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233页。

不过在模型 2 中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模型 2 也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脱贫信心有显著影响。家庭中劳动力数量越多,越有信心认为自己家庭近期内能够脱贫。

与模型 2 相比,在模型 3 中纳入了受教育程度变量。通过对模型 2 和模型 3 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11.13;自由度=3;P=0.011)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AIC 数值,模型 3 显著优于模型 2。这说明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了脱贫信心。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群体相比,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群体更有信心认为自己家庭在近期内能够脱贫。与模型 3 相比,在模型 4 中纳入了健康状况变量。通过对模型 3 和模型 4 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28.40;自由度=1;P=0.000)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AIC 数值,模型 4 显著优于模型 3。这说明健康状况对脱贫信心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差的群体,在家庭脱贫信心上也相对较低。

与模型 4 相比,在模型 5 中我们纳入了自我效能感变量。通过对模型 5 和模型 4 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28.32;自由度=2;P=0.000)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AIC 数值,模型 5 显著优于模型 4。这说明自我效能感对脱贫信心有显著影响。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要比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对自己家庭在短期内能够脱贫更有信心。然后,在模型 6 中纳入了社会支持变量。通过对模型 6 和模型 5 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28.08;自由度=2;P=0.000)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AIC 数值,模型 6 显著优于模型 5。这说明社会支持对脱贫信心有显著影响。与预期得不到社会支持的群体相比,预期得到社会支持的群体更有信心脱贫。最后,在模型 7 中加入家庭收入等级变量,通过对模型 7 和模型 6 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30.85;自由度=3;P=0.000)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AIC 数值,模型 7 显著优于模型 6。这说明家庭收入等级相对较高的贫困群体更有信心脱贫。

表 2 脱贫信心及其相关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参照类)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宁夏 (云南)	-0.18	-0.15	-0.26	-0.13	-0.14	-0.15	-0.28
女性 (男性)	-0.08	-0.11	-0.10	-0.02	0.02	-0.01	-0.03
年龄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已婚 (未婚)		0.31	0.55***	0.58***	0.57***	0.55***	0.58***
离婚或丧偶 (未婚)		0.19	0.43	0.47	0.51*	0.52*	0.52*
家庭 劳动力数量		0.16***	0.14***	0.14***	0.13***	0.11**	0.11**
小学 (文盲)			0.02	0.05	0.01	-0.02	-0.04
初中 (文盲)			0.23	0.24	0.21	0.16	0.08

变量(参照类)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高中及以上 (初中)			0.77***	0.71***	0.64**	0.59**	0.48*
健康状况				-1.32***	-1.23***	-1.14***	-1.08***
生活的可控制性 一般(不可控制)					0.53***	0.46***	0.45***
生活完全可控 制(不可控制)					0.80***	0.69***	0.66***
社会支持一般 (较少)						0.70***	0.67***
社会支持较多 (较少)						0.94***	0.90***
家庭收入等级 2 (等级 1)							0.37***
家庭收入等级 3 (等级 1)							0.59***
家庭收入等级 4 (等级 1)							1.11***
切割点 1	-2.08***	-1.39***	-0.92**	-1.02***	-0.59	-0.13	0.01
切割点 2	1.25***	1.96***	2.46***	2.41***	2.89***	3.40***	3.60***
随机效应							
层 2 方差(截距)	0.35***	0.34***	0.35***	0.36***	0.30***	0.29***	0.28***
模型拟合指标							
AIC	2455.72	2446.395	2441.26	2414.857	2390.534	2366.453	2341.6
对数似然值	-1221.86	-1214.20	-1208.63	-1194.43	-1180.27	-1166.23	-990.73
自由度	3	6	9	10	12	14	17

注: * p<0.1, ** p<0.05, *** p<0.01。

综合比较七个模型的拟合指标,我们可以认为模型 7 是相对较优的模型。根据模型 7,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性别和年龄对脱贫信心已经不具有显著影响了。模型 7 也显示,与未婚的贫困群体相比,已婚的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上相对较高,大约高出 78.6%。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脱贫信心越大。家庭劳动力数量每增加一人,脱贫信心大约增加 11.6%。此外,我们也看到文化教育水平对脱贫信心有影响,尤其是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对脱贫信心具有显著影响。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贫困群体相比,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上要高出 61.6%。不过,小学教育或者初中教育程度的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程度上并没有显著高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贫困群体。此外,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健康状况越差,脱贫信心越不足。不健康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脱贫信心大约会减少 66.0%。自我效能感也显著影

响脱贫信心。贫困人员如果认为自己一般情况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在脱贫信心上会大约高出 56.8%,如果认为自己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则脱贫信心会大约高出 93.5%。当贫困人员预期自己能够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时会显著提升脱贫信心。与预期获得较少社会支持的贫困群体相比,预期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上大约高出 95.4%到 146.0%。最后,模型 7 也显示,家庭收入等级相对较高的贫困人员有更高的脱贫信心。与家庭收入等级最低的贫困人员相比,家庭收入等级处于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贫困人员在脱贫信心上分别会高出大约 44.8%、80.4%和 203.4%。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在云南和宁夏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地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等多个变量对脱贫信心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不同婚姻状况和家庭劳动力状况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在脱贫信心上有显著差异。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脱贫信心就越高。此结果首先可以从规模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一般情况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一方面出去打工赚钱的人就相对越多,另一方面平均的生活成本和家庭负担也相对较低。^①因此,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在客观上就具备了脱贫的人力条件,主观上的脱贫信心程度也可能会相对较高。本文也发现,与未婚人员相比,已婚人员的脱贫信心相对较高。这一方面可能与上面提到的劳动力规模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婚姻的激励作用有关。^②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婚姻生活的必需条件(如住房和生活设施的改善)和期待(如孩子养育和教育所需的费用),已婚人员的储蓄要高于单身人员,同时也有相对较大的动力出去赚钱。由此可见,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之一就是劳动力数量较少的家庭和未婚人员。鉴于民族地区大龄未婚青年数量规模巨大,组建家庭的困难也阻挡着他们生活的信心。因此,提升少数民族贫困群体脱贫信心的途径之一要从婚姻家庭入手,协助贫困群体进行家庭建设。

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其脱贫信心显著相关。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脱贫信心也相对较高。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教育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③习近平同志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问题,以往也有研究论述了“扶志”和“扶智”之间的辩证关系。^④所谓的“智”指的就是文化素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比较积极并善于接受新事物,也使人们对自己学习新技能有较高的信心。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贫困群体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加相关的扶贫项目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不断增强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不断增强其脱贫的信心。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

① 参见 L. J. Waite, “Does Marriage Matter?” *Demography*, Vol. 32, No. 4, 1995.

② 参见 R. R. Rindfuss and A. VandenHeuvel, “Cohabitation: A Precursor to Marriage or An Alternative to Being Singl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6, No. 4, 1990.

③ 参见刘军豪、许锋华:《教育扶贫: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6年第2期;张琦、史志乐:《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创新及实践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④ 参见万远英、崔帅帅:《精神扶贫:减贫反贫的根本——基于成都市扶贫开发工作的调研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17年第32期。

的贫困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对新事物的抗拒或者对扶贫项目的被动接受,乃至拒绝看作是思想观念落后或者能力有缺陷,然后提出所谓的“改造”或者“消灭”贫困文化等论调。人们可以轻松地说出消除贫困的方法,但是改造或者消灭一种文化或亚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尊重文化差异的基本问题。^①因此,针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扶贫项目,比如教育培训或者农业推广服务等,应该考虑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认知水平,尽可能地减少项目给他们带来的认知负担,以及避免让他们面临复杂的决策。^②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就可能有更大的勇气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也更容易看到自己的能力,从而增强进一步脱贫的信心。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状况显著影响了脱贫信心。以往研究表明贫困和健康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恶性循环。^③较差的健康状况加重了医疗费用支出的负担,增加了与患病有关的生活开支并降低了劳动能力。^④医疗负担的加重和劳动能力的降低,乃至丧失,使得贫困群众很难有信心逃离“健康—贫困陷阱”。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健康状况的影响不仅仅集中在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疾病和健康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具有较强的文化含义。^⑤一旦患病,个体的自我概念可能发生变化,甚至与外部的互动方式和互动内容也会发生变化。社会对某些疾病的污名化使得患病的个体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一些重大疾病则会破坏或者扼杀个体的自我概念,导致自我和生活意义的丧失,从而使人们处于一种悲观的状态中。^⑥因此,我们的健康扶贫一方面需要通过医疗保障政策帮助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减少医疗支出并同时改善健康,^⑦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对患病者的自我概念和社会关系进行干预,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对其脱贫信心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综合感知和评价,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表现。因此,增强贫困群体脱贫信心的重要途径就是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根据社会学习理论,^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升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自我效能感。首先,引导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参与扶贫实践并发挥积极作用,让其获得成就感。通过采取贫困群众易于掌握和执行的项目,让贫困群体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并有积极成就,从而对自己能力有一个积极的评价。因此,提供直接提高个人能力或了解如何成功执行任务的培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其次,通过大力宣传成功脱贫的榜

① 参见 O.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ociety*, Vol. 1, No. 1, 1963.

② 参见 A. Mani, S. Mullainathan, E. Shafrir, J. Zhao,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ociety*, Vol. 341, No. 6149, 2013; E. Duflo, *Human Values and the Design of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Tanner Lectures, 2012.

③ 参见 A. Wagstaff, "Poverty and Health Sector Inequaliti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 80, No. 2, 2002.

④ 参见 D. McIntyre, M. Thiede, G. Dahlgren, M. Whitehead, "What ar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Households of Illness and of Paying for Health Care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y Contex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62, No. 4, 2006; 王培安:《全面实施健康扶贫工程》,《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

⑤ 参见 P. Conrad and K. K. Bark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Key Insigh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51, No. 1, 2010.

⑥ 参见 M. Bury,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 4, No. 2, 1982.

⑦ 参见付晓光:《健康扶贫兜底医疗保障的主要模式及思考》,《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7年第10期。

⑧ 参见 A. Bandura,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37, No. 2, 1982; M. E. Gist and T. R. Mitchell, "Self-efficac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ts Determinants and Mallea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7, No. 2, 1992.

样,使少数民族贫困人员从他人成功的经验中看到自己的希望。当贫困人员看到与自己境况相似的人已经成功脱贫后,也会提升自我期望,同时认为自己也具备与其相似的能力。此外,成功脱贫的榜样也会为个体传授如何应对挑战或困境的有效策略。通过这样一种社会比较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变贫困群体对自我效能的感知。

此外,少数民族群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也显著提升其脱贫信心。当一个人感觉到被关怀或者被尊重时,自我价值感就会提升,摆脱自己生活困境的信心也会增强。社会支持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连接着各种社会资源。较多的社会支持能够给人们带去信息、资金、技术等物质资源和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人们的脱贫致富提供有利的外在条件,同时也能增强人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因此,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不断扩大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增强网络的支持功能。首先,进一步加强家庭、邻里和社区等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不仅具有工具性支持功能,而且具有情感表达性支持功能。其次,扩大和加强政府、扶贫干部、社会组织等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扶贫干部要进一步发挥贫困群体和外部资源机会连接的桥梁作用,不断扩大贫困人员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当贫困人员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获得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服 务,还包括新的思维、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最后,也需要指出,虽然本文重点讨论了非物质因素在脱贫信心上的重要性,但是本文结果也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对于贫困人员的脱贫信心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扶贫”和“扶志”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所谓的“扶志”就缺少了现实基础。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脱贫攻坚工作需要 在加强经济扶贫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脱贫信心 的重要性,从外在结构性因素和内在的信心和动力两个方面着力,以实现贫困群体的永久性脱贫。

〔责任编辑 马 骅〕